

对话与融合： 四川基督教圣公会会督宋诚之的本色思想

张丽萍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610064 成都,四川省)

提要:本文以民国时期四川著名的基督教领袖为对象,考察其从官宦子弟成为教徒,晋升为主教的人生经历,分析其思想观念与地域环境、社会背景、时代变革之间的互动关系,探寻中国基督教在中西之间、传统与现实之间的交汇折中,借以丰富近代四川社会思潮的研究。

关键词:宋诚之、圣公会、基督教中国化

作者:张丽萍博士,教授,通讯地址: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610064;手机:86-13666211339;电子邮箱:huaxizlp@163.com

基督教自西徂东,与中国文化相遇交锋,为了适应和生存,自进入中国之初,就开始本土化、中国化进程,通过自我调适与革新,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传统与现实之间,走出一条求同存异、相互融合、共生发展的文化发展道路。早年的耶稣会士借“儒冠”“道袍”传教,从明末的利玛窦到清末的林乐知、丁韪良,都试图通过解释儒家经典文献来取得儒耶结合的理论根据,“以孔子理论傅会基督教教义,其策略为合儒、补儒、益儒和超儒”^[1]到20世纪,又一批新的教会人士承袭了这一思路,同样从典籍考证、分析入手,说明基督教义与儒家文化相通相融。与当年有所区别的是,此番的主角已经不再是外国来华的传教士,而是一代新成长起来的中国思想者。基督教中国化、本色化运动在教会内部渐次兴起,由19世纪的微澜,以至20世纪中的大波,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冲击下,不断发生的针对基督教的政、学潮,汇合成一股巨大的推动力,迫使教会急思改进,以免却沉沦、淘汰之祸患。在“更基督化”“更中国化”“更有效力”^[2]的旗帜下,一批具有新知识、新思想的中国教会人士,以“本色教会”“国化基督教”的声音,呼唤教会的革新。四川宗教领袖宋诚之就是其代表之一,由于他的会督(主教)身份,凭借他的影响力,对消除教会的西洋传习,对基督教义的“中国化”颇有建树;在他重要的“本色著作”

[1] 侯外庐 Hou Wailu,《中国思想通史》Zhongguo sixiang tongshi [China History],(北京 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01),1080。

[2] 吴哲夫 Wu Zhefu(E. W. Wallace),《如何让基督教在中国更有效力更持久》*Ruhe rang jidujiao zai zhongguo geng you xiaoli geng chijiu* [How to make Chinese Christianity more lasting and more effective],《华西教育季报》Huaxi Jiaoyu Jibao [West China Education Quarterly],1922。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3]中,他提出崇尚中国文化,采用中国礼仪,在当时教会内部曾经引起过比较强烈的反响,也吸引了国内思想文化界的注意。

一、宋诚之其人及本色思想形成

宋诚之(1892-1955),又名忠廷,祖籍安徽,生于四川成都。根据有关文献和调查,整理出以下简况:^[4]

宋家以诗书传家,家谱所记,明清两朝间先祖有多位在朝廷为官。清末,宋诚之的父亲宋书臣(?-1908),在陕西任县官,后迁居四川华阳,后迁居成都青年巷,有房产80多家。另据邸永君《宋蜀华先生访谈录》称:“祖父书臣公幼年家贫,刻苦自励,熟读经史。后以吏员入仕,晚年定居蓉城,与成都知识界多有交往。他长于诗文,尤以书法、篆刻闻于当时。在我的记忆里,家中陈设古雅,藏书数量可观。”^[5]

宋书臣娶有二房太太,先后生育宋诚之、宋杰人(1910-1980)。杰人又名忠俊,年幼丧父,由兄供其读书,后在重庆青年会任干事、副总干事、总干事。解放后,为重庆基督教三自革新委员会负责人之一,重庆政协委员。^[6]

宋诚之于1919年参加圣公会,其时年已20多岁,他为何在而立之年成为基督徒?关于其信仰的原因有两种说法。其一,《四川基督教·宋诚之》中称,“青年时代宋诚之就因酷爱英文,接触教会人士较多,对基督教由好奇而探索,进而潜心研究,终于决心为实现博爱平等的基督精神而贡献力量。”其二,其子女称,“父亲(宋诚之)因不满于当时专制黑暗家庭而加入基督教”。通过调查发现,宋诚之的信仰转化并非是偶然的,从他的早年经历中可以窥见其中时代的、社会的、家庭的因素。

宋诚之自幼好学,1909年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的中学。其时,国家积弱,民生凋敝,青年学生多把目光转向国外,希望出国学习,为国家社会服务。他也秉承此志,考入清华学堂公费留美学生班,因为封建家庭阻拦独子远游,而未能如愿。据宋蜀华在其回忆中称:

父亲字诚之,自幼饱读诗书,后就读于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曾与郭开贞(即郭沫若)、周太玄(曾任四川大学法学院院长)为同窗挚友。当时西风东渐,我父对西学特别是英语产生了极大兴趣,曾考取北京清华学堂,但由于受传统儒学观念影响的祖父之反对而未能前往;继而为摆脱家庭束缚,离家出走,又被寻回。然父亲却心如盘石,不改其志。^[7]

不久,他考入成都外国语学校及译才养成所专修英文。由于他精通英语语法,掌握大量词汇,有

[3] 宋诚之 Song Chengzhi,《基督教与中国文化》*Jidujiao yu zhongguo wenhua*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原载《基督教丛刊》*Jidujiao congkan* [Christianity Series],No. 8,1-14,1944年11月,该文收录于张西平 Zhang Xiping 主编:《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Bense zhi tan:20 shiji zhongguo jidujiao wenhua xueshu lunji* [Research on Indigenization: 20th Century Chinese Christian Culture Academic Essays],(北京 Beijing: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Zhongguo guangbo dianshi chubanshe [China Radio and Television Press],1998),76-101。按:本文以下所引宋诚之言论,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该文。

[4] 根据宋诚之儿女的有关资料,张丽萍 Zhang Liping,《对华西世家宋蜀芳老师家庭的跟踪调查》*Dui huaxi shijia song shufang laoshi jiating de gengzhong diaocha* [Investigation on Christian Family Song Shufang],1992-2007年(未刊稿)。

[5] 邸永君 Di Yongjun,《宋蜀华先生访谈录》*Song shuhua xiansheng fangtanlu* [Mr. Song Shuhua Interview],《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0年卷)》*Zhongguo minzu yanjiu nianjian 2000 nian juan* [China Minorities Research Year Book of 2000],(北京 Beijing,民族出版社 Minzu Chubanshe [China Minorities Press],2001)。

[6] 宋杰人经历参见刘吉西 Liu Jixi 等著,《四川基督教·宋杰人》*Sichuan Jidujiao* [Sichuan Christianity. Song Jieren],(成都 Chengdu:巴蜀书社 Bashu shushe [Bashu Press],1992)。

[7] 邸永君 Di Yongjun,《宋蜀华先生访谈录》*Song shuhua xiansheng fangtanlu* [Mr. Song Shuhua Interview],《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0年卷)》*Zhongguo minzu yanjiu nianjian 2000 nian juan* [China Minorities Research Year Book of 2000],北京 Beijing,民族出版社 Minzu Chubanshe [China Minorities Press],2001)。

“肉字典”之称。毕业后,在华西协合中学、岷江法政学校等学校任英语教员。1917年考入华西协合大学英文系,半工半读,1924年获文学学士学位。不久出国深造,1928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研究院。回国后成为成都知名的英文教授,先后受聘于成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等,G. F. S. Gray这样评价他说:“(宋)主要在成都的学生之中工作,声誉颇高”。〔8〕1928年他出任中华基督教圣公会西川教区会长,1934年任中华基督教圣公会四川教区和西川教区副会督、会督,主持并积极开展教会工作,直到1950年退休。解放后在四川文史馆任研究员。

从官宦子弟,到新学青年,从英文教师到教堂牧师,从留洋才子到主教,催生了宋诚之独特的人生观、宗教观和伦理观,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儒家伦理与基督精神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探寻其思想成因主要有:

其一,宋诚之生长在“蜀学勃兴”的时代,从清末到民初,四川政要大力倡导“尊孔读经”,使四川尤其是省会成都趋于守旧,传统文化的根基在这里十分坚实。出身于书香世家的宋诚之,深受此种氛围的熏陶,打下了儒家经典的基础。其子女称:

父亲16岁时祖父就去世了,从那时开起,父亲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他在成都市各个中学教英文40余年,在他二十余岁时参加教会,工作三十余年,他经常担任两个专任工作,有时三个专任工作,他一生是很辛苦的,他不喜欢政治,他说搞政治是危险的,生活无定,所以家中往来之人很少军政界的,大多是教育界宗教界,他没有别的嗜好,唯一就是读书,数十年如一日,黎明即起,祈祷颂经,每天至少读两小时书。〔9〕

而G. F. S. Gray著《中华圣公会历史》)也称赞宋:“他是一个博学的人,与四处奔波访问各乡村牧区相比,他更乐于呆在大学的圈子里,事实上他把他作为主教的职责与教书结合起来”。〔10〕

其二,宋诚之所在教派圣公会,素以本色教会为标榜,教会主张由中国籍传道人“独立经营”教会。在圣公会传入中国不久,就先后开办上海圣约翰大学、武昌文华大学、中央神学院等院校,培养教牧人员。圣公会在各地的中国牧师的人数,普遍较其他教会要多,如四川圣公会更是走在前列,在四川就提升古鹤龄、宋诚之为主教。

其三,由于宋诚之自幼熟读经史,对儒家思想、孔孟之道很有心得,他在英国留学期间,潜心攻读英国文学和神学,对神学颇有造诣,后又从事基督教工作,成为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及基督教教义三者紧密结合的代表人物。他曾经说过:“余固信耶教,而深爱耶稣者,余又爱我国,及我国数千年文化”。对宋诚之来说,其家庭背景、地域环境、宗教信仰,与人生经历,加剧了他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基督与孔子之间的无数次思想交锋和哲理论辩,从而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伦理观。他既是一个虔诚的“洋教徒”——“数十年如一日,黎明即起,祈祷颂经”,“每日读经祷告,未尝间断”,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中国文化的捍卫者、赤忱的爱国者,正如《四川外事志·出访·文化》中记载的:

1938年夏,中华基督教圣公会西川教区会督宋诚之,应香港教会的邀请,两次赴香港讲道,并广泛宣传抗日。1941年夏,宋应邀到澳大利亚介绍中国抗战情况及抗战中的教会工作,争取澳大利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在澳期间,他数次遭到日本间谍警告。在形势逼迫下,宋立下遗嘱,并灌

〔8〕 G. F. S. Gray 著,Martha Lund Smalley 编辑整理《中华圣公会历史》*Zhonghua shenggonghui lishi* [China Anglican Church History],章开沅 Zhang Kaiyuan 主编:《基督教与中华文化丛刊》*Jidujiao yu zhonghua wenhua congka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Series],(武汉 Wuhan:湖北教育出版社 Hubei jiaoyu chubanshe [Hubei Education Press],2004),516。

〔9〕 张丽萍 Zhang Liping,《对华西世家宋蜀芳老师家庭的跟踪调查》*Dui huaxi shijia song shufang laoshi jiating de gengzhong diaocha* [Investigation on Christian Family Song Shufang],1992-2007年(未刊稿)。

〔10〕 G. F. S. Gray 著,Martha Lund Smalley 编辑整理《中华圣公会历史》*Zhonghua shenggonghui lishi* [China Anglican Church History],章开沅 Zhang Kaiyuan 主编:《基督教与中华文化丛刊》*Jidujiao yu zhonghua wenhua congka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Series],(武汉 Wuhan:湖北教育出版社 Hubei jiaoyu chubanshe [Hubei Education Press],2004),516。

成留声片, 邮寄回国, 嘱咐家属, 勿忘国耻。^[11]

一方面, 他身上有太多西洋的烙印, 但另一方面却保留了传统的伦理价值, 在他的宣道、讲演乃至个人及家庭的作风上, 对传统伦理表现出相当大的执着, 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除极其保守的人之外,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再崇拜祖先”,^[12] 而他却在教内宣传出祭祖“万不可废”的口号。他教育女儿对丈夫要依从, 对公婆要孝敬等。其子女称: “由于有年轻时的经历, 加之其留学过程中受西方传统之熏陶, 父亲虽对子女要求甚严, 但却非常开明。他认为, 父母之首要责任乃将子女塑造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 因而倾其全力培养子女读书。我姊妹兄弟 7 人, 都曾受到高等教育, 各有专攻, 先后服务于教学或科研单位。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宽松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13]

二、融合耶儒的本色观

1. 调和耶儒矛盾

自基督教东渐以来, 传教士竭力要打破中国的信仰崇拜, 而代以救主赎罪、末日审判、天国永生的教理, 因此注定要在社会中挑起冲突。我们很容易看到这样的对立: 在传教士眼中, 中国人遵循的儒家学说是“愚昧”和“荒谬”的, 反过来, 基督教的教义和践行, 又被国人视为邪说和妖术。一方是传教士发出不妥协的宣战, “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 而一方是捍卫圣道者的怒斥——“先锄天主耶稣之名, 乃能维持圣道”。^[14]

儒、耶果真是水火不容吗? 如何才能缓和双方的势不两立? 总结历史的经验, 早年的耶稣会士借儒冠、道袍传教, 虽然不失为扬汤止沸的手段, 而传教士对“耶稣心合孔子”这一理论的发现, 可谓是釜底抽薪的良策。从明末到清朝, 一些传教士都试图通过解释儒家经典文献来取得儒、耶结合的证据, 如“吾天主, 即华言上帝”(利玛窦), 又如“儒家重五伦, 吾教亦重五伦”(林乐知), 以为将基督教教义加上中国式的阐发, 更能被中国人接纳。到 20 世纪 20 年代, 中国教会人士承袭了这一思路, 同样从典籍考证、阐释入手, 推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与融合。

“我来非是废除, 乃是成全”, 耶稣的圣言成为本色派人士融合儒耶的口头禅。在他们看来, 基督教应该与儒家思想找到沟通的桥梁, 在悉心研究后, 他们发现两者之间有着广泛沟通的可能性。宋诚之就是其中之一, “余研究信任基督教, 三十余年矣, 每日读经祷告, 未尝间断, 愈研究愈觉大道精深, 于国于人有益, 且与吾国孔孟之道, 毫不冲突。”他甚至明确指出, “耶稣之教义, 亦即孔孟之大道。”

然而, 他又该如何解释基督教义与中国伦理的格格不入呢?

中国人祭拜祖宗鬼神, 基督教一概反对, 中国人重男轻女, 许男子娶妾, 不许女子失节, 而基督教坚持一夫一妻; 恋爱自由、婚姻自由, 父子别居……这些随基督教俱来的且令时人痛心疾首的“西化”, 与中国固有的“人伦”之理是背离的。

在对经典对比研究后, 宋诚之有了他的发现: “余研究耶教有年矣, 常读经典, 深知耶稣之教, 讲孝弟, 重人伦, 而实行推恩博爱, 与孔孟之道不相违背。”他大量引用《圣经》作证, 如“十诫”中“当孝敬

[11]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Sichuansheng difangzhi bianzhuanyuanhui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Sichuan Provincial Chorography] 编, 《四川省志·外事志》Sichuan shengzhi. Waishizhi [Sichuan Provincial Chorography.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1。

[12] G. F. S. Gray 著, Martha Lund Smalley 编辑整理《中华圣公会历史》Zhonghua shenggonghui lishi [China Anglican Church History], 章开沅 Zhang Kaiyuan 主编, 《基督教与中华文化丛刊》Jidujiao yu zhonghua wenhua congka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Series], (武汉 Wuhan: 湖北教育出版社 Hubei jiaoyu chubanshe [Hubei Education Press], 2004), 516。

[13] 邸永君 Di Yongjun, 《宋蜀华先生访谈录》Song shuhua xiansheng fangtanlu [Mr. Song Shuhua Interview], 《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0 年卷)》Zhongguo minzu yanjiu nianjian 2000 nian juan [China Minorities Research Year Book of 2000], (北京 Beijing, 民族出版社 Minzu Chubanshe [China Minorities Press], 2001)。

[14] 学会讲义《Xuegui jiangyi [Society Lecture], 载《蜀学报》Shuxuebao [Sichuan Journal], No. 11。

尔父母”,以此论定摩西于数千年前,“已认定孝敬父母为立身之本”;又如耶稣对父母的顺从(分别见路加福音二章·51节,约翰福音二章·23节,约翰福音十九章·26~27节的记载),因此断言,“(耶稣)自幼至壮至死,莫不以孝弟为怀”;而福音书关于耶稣为门徒之母治病,可见耶稣“对人推恩之真义”(见马太福音八章·14~17节),“耶稣之教,光明正大,其教人也,有尊卑长幼之分,而其爱人也,南北西东,一视同仁,故世间言博爱者,每称耶稣。”

倘若耶、儒之伦理是不相违背的,为何两者却有现实的冲突呢?宋诚之认为根源不在基督教本身,而在于传教者和受教者偏传偏信——受到欧美风俗“毒化”的缘故。这位对西方文明相当了解的中国人,对于欧美风俗,一直是抱着轻慢和不屑的态度,他曾多次公开抨击西洋风俗,指出它的虚伪和无情。令他不安的是,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动以我国风俗习惯为恶,冀以带来之欧美风俗易之”,“而教会中之本国同事,往往受西教士所带来之习俗,奉为教义”,而国人又不“只顾皮毛,不顾实际,只见暂时,不问将来,从而和之,亦觉我国种种果不如人也。于是尽弃我国立国立人之道,全部效法欧美。”他竭力将基督教与欧美的风俗、制度划清界限,他告诫世人说,“欧美现有之社会制度,非本耶稣教义”、“欧美今日之家庭制度,离基督大道甚远。”

宋诚之的种种比附,其核心是为了基督教能够“大行于中土”。这正如他所感慨的那样,“深悲耶稣之大道不行,而更悲我国不得其益也。”同时,他又不忍背弃中国文化,不忍见国人因信教而背负“灭祖忘宗”的骂名,更主要的是,他真诚的认为,儒家的伦理道德不仅是“我国几千年立国立人之高尚文化”,而且还具有世界意义,拟将儒家的孝弟之道“广播与万邦”,化暴戾为慈祥的世界。他盼望欧美人士“恭敬受教,学习孝弟之义,推恩之道”,“使人人实行孝弟博爱为怀天下一家中国一家,杀人流血之战祸惨毒侵略之野心,其将变而为先人后己,互助合作之文明乎。世界永久和平之基将于此奠定。”从一定意义上,他的这一价值取向突破了过去外国传教士单纯的“合儒”“补儒”的思路,而是把“儒家”学说中的伦理也提升为一种具有“普世性”的伦理,从而使儒家学说和基督教学说,中西文化在一种平等基础上互补与会通。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观点,在四川教会人士中并不孤立,如方叔轩就撰文称“中国立国数千年的文化,并不能完全没有缺点,但也有比欧洲强的”,他列举了孝亲、敬祖、和平、诚实、和蔼、布施等。^[15]

2. 用祭祖之礼“国化基督教”

回到现实中来,究竟该如何“采集”儒家伦理以“修补”耶教,宋诚之将容许中国教徒敬拜祖宗作为突破点。

“除上帝外不拜别的神”,这是他虔诚信奉的,但他却反对因为独拜上帝而禁人祭祖的教条,喊出了祭祖“万不可废”的鲜明口号。

“吾国人信仰耶教,一入教会,则禁止纪念祖先,且并祖先牌位而焚之,弃之。”对于教会在祭祖问题上的强硬作法,宋诚之分析到,其中既有政治的,也有文化的因素:“耶教自西来华,正值列强侵略我国战败之时,西传教士,既挟其上国文明,而蔑视我国之一切风俗习惯,其所与游处者,又为我未经诗礼熏陶之粗浅人民,遂益庞然自大,尊自卑人,误认吾国祀祖敬孝为拜偶像,使凡参加教会之人,必须停止纪念。”

在他看来,教会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的做法,从理论到实践,既是错误的、也是失败的。首先,祭拜祖先只是国人对先人表示一种敬意,“敬祀祖先,非以先人为神,与上帝匹敌,乃人生报本返始,慎终追远,遵行上帝诫律,孝顺父母之大道,纪念尊敬,则效祖先,或劝善,或警恶,皆与基督教教义精神毫不冲突者”,而且《圣经》中也不乏纪念祖先的记载,可知祭祖并未违背耶稣的教义。

[15] 方叔轩 Fang Shuxuan:《基督教在中国有恒久位置没有》*Jidujiao zai zhongguo you hengjiu weizhi meiyou* [If Christianity has long life in China],《华西教育季报》*Huaxi jiaoyu jibao* [West China Education Quarterly], No. 2, 1924。

其次,他认为不应将上帝与中国对立起来,“基督教来华宣传,既称为道德崇高之宗教,岂可使人蔑弃祖先而不敬哉?”更进一步,他说“祭祀祖先,乃培植良心之根本办法,”教会不仅不应禁止信徒祭祖,反应该尽力提倡。并列出了基督徒祭祖的11条建议,其中既有发扬,也有禁忌,如保留祖先牌位,“凡遇祖先生死祭日,及每年通行之节期,例如新年、两节、中元、冬至等日,均当纪念之”,然旧俗所供奉的“一切偶像杂神,悉去除之,例如财神、土地、观音、药王、坛神,及其他种种家神,只纪念祖先,而不能杂有任何偶像。”“纪念时可用香烛鲜花,及奉献祖先生前喜欢之物,惟不得烧钱纸金银锭等,涉及迷信。”可见其分寸也是无离教旨。

最后,他在分析了近百年传教的得失后,认为禁止教徒祭祖,是“断丧人伦”、“灭绝人伦”,由此基督教被视为“洋教”而为大多数中国人所唾弃。“教会禁人祀祖,灭人根本,乃其大罪,大有害于我国,”如果不在祭祖问题上做根本改革,教会徒呼“中华归主”之口号,实足贻笑大方,增人唾弃。

三、对宋诚之本色思想的思考

在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中,既有“儒化”基督教的内容,也包括“本色”教会的内容,如诚静怡所说,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文明,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调和,一方面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使教会成为“中国人自己的教会”,从而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16] 宋诚之是四川著名的本色派人物,据史料记载直到1949年四川的中国会督仅3人,由于他的会督身份,凭借他的影响力,对消除教会的西洋传习,对基督教义的“中国化”颇有建树。如1930年他在成都皮房街教堂创办高级神学院,除教授宗教课外,还要求学生必须学习中国文学和历史知识等。他还聘请了著名的国学大家、“五老七贤”如林山腴、余苍一、朱青长等教授。这些学生毕业后,都分别担任圣公会西川、东川两教区各地的会长。宋诚之任主教的17年中,如其所言,“圣公会应该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自立的教会”,并努力加以实践。^[17]

宋诚之发表在二战结束前夕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文,是为他本色思想的集中表现,也是当时四川教会人士主流思想的一个折射。从他这篇万余字的文章中,宣泄了一个宗教领袖对西方“文明”的失望,以及对教会因循守旧的失望,呼吁国人切莫受西化的毒害,而要回归传统,重建儒家的伦理道德,呼唤教会放下架子,吸收中国的高尚文化,并由衷地盼望屏弃沾染在教会身上的那些西方丑陋风俗,让基督教回归真义。

不难发现,他对中国文化鼓吹和宣传,他对儒家推崇和敬意,目标是为了服务于他所信仰的基督教。从20世纪初以来,随着时代的递进,经过中外教士的长期修饰装扮,在华基督教出现“儒化”“佛化”的色彩,表现出日益丰满的“中国化”特征,证明了耶儒间为了某种需要可以达成一定程度的调和。然而,并不能因此就妄下断语,认为基督教能融合贯通于儒学精神之中,甚至如某些人士所设想的如同唐宋时期佛教同化于儒学内,而大放宋明理学的奇葩,或者以为古老的中国儒学有足够的度量包容基督教,甚至借此机会将已经日暮途穷的儒家伦理推行于全球。这两种设想,要么是出于传教的机会主义目的,要么是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前者至少在已知的过去或者可预见的未来,都是不切现实的,而后者也是不合时宜且有开历史倒车之嫌。

对于像宋诚之这派“本色”人士来说,必须小心把握着这样一个微妙的平衡——既要用耶稣“成全律法”堵住教内人士的反对声浪,又要以“耶稣之教义,亦即孔孟之大道”的论证来讨中国人的欢迎,这

[16] 诚静怡 Cheng Jingyi,《协进会对于教会之贡献》*Xiejinhui duiyu jiaohui zhi gongxian* [Contribu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Church],载《真光杂志》*Zhenguan zazhi* [True Light Magazine],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

[17] 刘吉西 Liu Jixi 等著,《四川基督教》*Sichuan Jidujiao* [Sichuan Christianity],(成都 Chengdu:巴蜀书社 Bashu shushe [Bashu Press],1992),556。

种左右逢源的中间立场,在宋诚之以及其他“本色作家”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从根本上,他们的大胆假设离不开耶儒“心合”“神似”范畴,小心求证不外乎考究学理、文字检索,大量精力都自觉不自觉地陷于自己所设计的学理考证之中。即便在他们高唱的论点中,诸如“佛化基督教”“儒化基督教”,乃至“国化基督教”,在一些人看来,不过是用机械的方法,将基督教义与儒家伦理教条生硬联系起来,不仅难以自圆其说,而且与历史和现实自相矛盾。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宋诚之的论断、观点就受到一些名流的奚落,指出他是在曲解误解《圣经》,挖苦他对中国文化及思想有近视偏见,甚至指责“他有些思想上的错误,将来为害甚大,贻笑万邦”。

English Title:

Dialogue and Integration: Thoughts of Bishop SONG Chengzhi of the Sichuan Anglican Church

ZHANG Liping

Ph. D. , Professor; Add: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of Sichuan University, 610064; Mobile: 86-13666211339; E-mail: huaxizlp@163.com

Abstract: This thesis studies Song Chengzhi, a famous Sichuan Christian leader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It studies his life experiences, his steps from the son of an official family to becoming a Christian, and to becoming the Bishop of the Sichuan Anglican Church. The thesis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is ideas and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social background, and the change in times. It explores the improvement and compromise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in-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long with tradition and reality, in order to enrich the study of social thought in modern Sichuan.

Key terms: Song Chengzhi, Anglican Church, Indigenization